

独立阅读

2007 年 11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美国·休斯敦）

友情翻译：陈丹丹（南京）

编者按：

有朋友来信关切地问及“独立阅读”的财政状况，这里可以向诸位汇报的是，“独立阅读”是零成本运作，所以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中止。感谢诸位作者，虽然并无稿酬，他们依然做出“无米之炊”。本期评论的图书除了来自中国大陆，还来自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地，这是什么精神？借用大陆读者熟悉的语录，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还想特别感谢来自台北的 Dean 先生，他对“独立阅读”的文章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这位朋友正是我们理想中的读者，“独立阅读”的读者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但我们最为在意的并非数字。如果“独立阅读”只有 10 位 Dean 这样的读者，我们依然会坚持下去。思想的交流，从来就不是用数字计算出来的。

目录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沈展云：社科

苏小和：经济

成庆：思想

王晓渔：文史

书评

张昕：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迷思

严飞：巴黎，何以为巴黎

戴新伟：德国新生代文学：可以写诗的一代

马慧元：诗人霍尔

刘柠：哈“不良”——时尚文化的原动力

成庆：小提琴艺术的传薪人

译介

杰尔夫·戴尔：世纪播放列表

影像

汪伟：阿富汗少女：Sharbat Gula

來論

Dean：吴强《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读后

推荐

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54元。

对于关心“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读者来说，既可思考这二十多篇文章中提出的很多现实问题，亦大抵可知“后马”理论家（包括部分西方“新左派”理论家）是怎样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

[法]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15元。

勒高夫从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伦理、人性、正义、道德、箴言、文学、神话、故事传说、行为习俗、罪与赎罪、富裕与贫穷、职业、神学、宗教、死亡（炼狱）、永生（天堂）诸多方面展开对高利贷的历史叙述，呈现一幅栩栩如生的“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图景。

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9月，35元。

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美]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28元。

这位被纽约时报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因此他可能不是中国官方欢迎的学者。

[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55元。

尽管我对这位女性哲学家的工作充满了敬意，但是她在序言中将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相勾联的作法，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某些不安。

[美]哈里·雅法：《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赵雪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39.8元。

这位“西岸斯特劳斯学派”的代表认为，林肯与道格拉斯当年关于南北政权的论辩其实就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翻版而已。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10月，42元。

读到一本与个人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的研究著作，不知为何，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张宗子：《书时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9月，18元。

记载了作者和“枕中秘本”的亲密时光

[俄]列斯科夫：《奇人录》，非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19元。

本雅明的名篇《讲故事的人》就是阅读列斯科夫有感而发的产物。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8月，39元。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里曾经畅想过自己的文学史观，可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实现这个美丽蓝图的除了他本人，恐怕就只有田晓菲了。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书评人 沈展云 (广州)



“后现代”是一种无所不能的“解构术”，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亦可以化神奇为腐朽；它无远弗届，大小通吃，古今学理，尽入彀中。据说一经“解构”，经典理论的权威性即受到质疑，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后经典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 8 月出版的“后经典文丛”——《后资本主义》、《后帝国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当可归入“后现代理论”之列。五种“后经典”都是翻译的论文集（以英美学者的论述为主），如书名所示，探讨的问题是这几种“主义”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变化与发展。

《后资本主义》“导论”谓：“后资本主义”概念的研究是 20 世纪后期在欧美学者中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和学术现象，“在人们关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同时，却没有留意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复存在”；传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然“终结”，而“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结构性转型的“知识社会”，其经济特征是“联合经济”。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德鲁克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导阶级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面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猛烈批判传统资本主义的西方左翼理论出现了“目标缺失”。

马克思之前已有种种乌托邦构想，泊马克思以其洞见和睿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构想了“新世界”的蓝图，乌托邦才真正在世界范围内付诸大规模的实践或曰社会革命。诂料马克思的正统学说和思想体系，在其身后即不断被“修正”；更有甚者，一众异数以“后学”为名，依附门下，打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后马”（包括“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学说”的微言大义多有“解构”，在感情上既守护又疏离，故有论者慨然曰：后马克思主义是“残余的乡愁”。《后马克思主义》一书分为四个专题：“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访谈录”，对于关心“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读者来说，既可思考这二十多篇文章中提出的很多现实问题，亦大抵可知“后马”理论家（包括部分西方“新左派”理论家）是怎样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与前述的《后马克思主义》一并阅读，可加深对“后马”理论的了解。毋庸置疑，当此“后冷战”时代，“后马”是一股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思潮，影响涉及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美学、语言学诸多学科；此书中如新修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后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等等论题，“在左翼、右翼乃至中间阵营中均激起持续不断的争论”，深而言之，说是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政治的未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也不为过。

这几年，翻译的有关欧洲中世纪历史文化的著作，所见的有十多种，最近，又见两种中世纪研究著作：[英]罗伯特·巴特莱特著的《中世纪神判》（徐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8 月）和[法]雅克·勒高夫著的《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4 月）。

勒高夫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杰出学者，其名著《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已有中译本。“年鉴学派”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其第一、二代核心学者是费弗尔、布洛赫（《法国农村史》，余中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和布罗代尔（主要著作《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三联书店，1992、1993 年；《法兰西的特性》，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1995、1997 年；《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中坚人物，为



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还有费雷（一译傅勒，著有《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和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许明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说：“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他指的是所谓“新史学”——勒高夫等人曾主编《新史学》一书——主要是指“年鉴学派”。



勒高夫是“年鉴学派”中涉及“心态史研究”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尤其对中世纪史有实质性的学术贡献。有论者指责“年鉴学派”只关注历史的细节，而忽视了政治。伯克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纵使年鉴学派学者群中的中世纪史学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其他主题上，也没有摒弃政治史，如勒高夫撰写的传记《圣路易》，就是以生活在13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被罗马基督教会追封为圣徒）这位中古统治者为主线，进而研究中世纪的政治史。只不过勒高夫认为，就“政治不企望自主性”这一层面而言，政治不再是历史的“主干”（见伯克著《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勒高夫关注的是，“在圣路易一生的某一时间中，与13世纪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时间方面的条件对应，演变的各个阶段及其一般风格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圣路易所处的时代，经济的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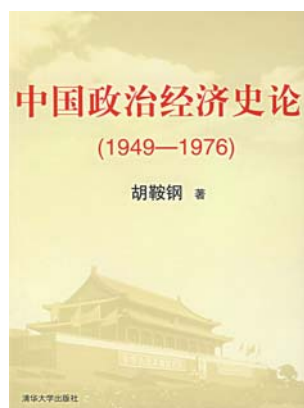
进步、农奴制度的终结、城市市民地位的确立、近代封建国家建设、经院哲学的胜利、托钵僧虔诚方式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接近尾声。这些重大事件的节奏以不同方式分割了圣路易的未成年、成年和老年时期，也分割了他1244年患病前后和1254年率领十字军东征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些事件的节奏有时似乎加快了历史的发展，有时又似乎阻滞了历史的发展”（《圣路易》作者引言）。这样涉及广阔历史层面的研究，无疑已包含了政治史。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一书只有八万多字，贯穿全书的关键词是“高利贷”。勒高夫说，高利贷是中世纪诸多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这七个世纪里，有哪一个现象比它更能展现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爆炸性混合呢？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勒高夫从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法律、生活、伦理、人性、正义、道德、箴言、文学、神话、故事传说、行为习俗、罪与赎罪、富裕与贫穷、职业、神学、宗教、死亡（炼狱）、永生（天堂）诸多方面展开对高利贷的历史叙述，呈现一幅栩栩如生的“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图景。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10月的中国，颂歌遍地，经济学领域似乎也不能幸免。我在一大堆异口同声的赞歌中，努力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比较艰难的事情，头顶经济学家称号的教授们都在争先恐后为伟大的报告背书，读者一不小心就能遇到那些似曾相识的观点。

比如现在，我读到了胡鞍钢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7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如此宏大的标题，显然试图总结历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钢却想将纷繁的历史整合在一种醒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而他的同僚，国务院认可的“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所著《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2007年9月），则是用了煌煌巨著来演绎政府之力。王绍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即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其公式定义为：国家能力是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之比。王绍光把国家能力分为

四种能力：一是汲取财政能力，二是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

这样的阐释与我们天天在报纸、电视里接受到的熏陶太一致了，我猜测高层肯定喜欢这样基于国家建设的学术体系，即所谓的“大国崛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王绍光应该是 1977 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第一届北京大学毕业生，与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是同窗学友。日后，李在政界稳扎稳打，王绍光则成为耶鲁大学的博士和教授。据胡鞍钢介绍，王绍光和胡鞍钢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十分接近，二人从这个时候开始合作，并于 1993 年 5 月下旬完成了《加强中央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撰写该报告的主要目的，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国家能力的概念和内容，集中研究国家能力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系，并分析影响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各类因素。二是促进决策者早下决心，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重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长治久安。我们看到，1993 年 11 月，中国决策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构想，并不断演进，可能相关构想中就有胡鞍钢和王绍光的学术贡献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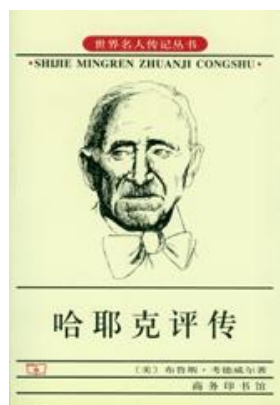
胡鞍钢为王的著作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高调称赞王绍光的学术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从研究路径上来看，他是问题导向的；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他是实用主义的；从研究问题上来看，他是在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胡鞍钢认为王有扎实的西方理论背景，但没有囿于西方理论的条条框框；植根于深刻的中国现实问题，但没有困惑于中国现实的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中国研究学者，不应该简单地实行“拿来主义”，拿着西方的理论标尺来量中国的现实身材，而应当大力推崇“实践主义”，用中国的事实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并创新中国的理论，展现出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

胡鞍钢还批评了很多人把王绍光称为“新左派”的现象，认为这有些牵强附会，胡称王为“实事求是派”。王所讨论的理论不是十分抽象的不着边际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他不迷信所谓“理论教条”，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包括理论分析，也包括实证分析，因而他所提出的见解就具有解释力，也具有预测力。

我个人对胡鞍钢和王绍光的著作有兴趣，是因为我在 17 大的报告里，似乎读到了他们的影子。比如牢固坚守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的国家发展能力、中国特色、民族意志等等。这种高拔的宏大叙事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可以却与伟大的奥地利学派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大异其趣。

又要回到起点来思考问题了，这就是著名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还是大政府、小市场，眼下的情势似乎倾向于建立一个全能的政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的教授们大概就是在按照这样的思路影响着高层。

但吴敬琏先生较早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没有因为国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相反，设租和寻租活动，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等社会病害问题愈演愈烈。吴先生为此推出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 2007 年 9 月)，痛陈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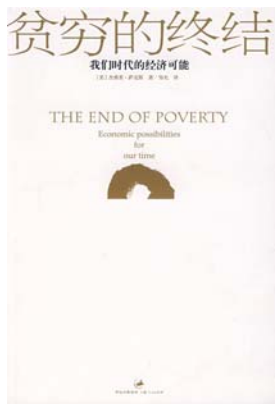


更多的人可能会被胡鞍钢和王绍光呼唤的“国家能力”所俘获，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教育背景下，人们非常容易认同这样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国家能力的指向，与形成国家能力的方法有直接关系。我最近细读《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6 月)，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花了整整第一卷的分量，来考证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论战，其中就提到俾斯麦时代的德国能力，当时流行一种宫廷理财学，与今天的胡鞍钢、王绍光有一些类似。现在看来，正是俾斯麦时代的国家能力对自由经济的抵制，导致了后来的德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

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思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我是如此地不喜欢“宫廷理财学”，所以更愿意沿着吴敬琏先生的思路往前走。中国经济最近 30 年的发展，究竟是国家能力提高所致，还是国家释放了一部分权力，导致民众终于有了经营市场的能力，再反过来推动了国家能力的提高？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吗？国家能力是市场发展的原因吗？现实的情况是，30 年来，国家能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很多奇怪的现象却层出不穷。比如有人在财富的流动中左右逢源，有人却只是一名看客。某些有权阶

层和既得利益阶层把市场经济看成了一间“私人俱乐部”，看成了一个“钟罩”。更多的组织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另外一些人拒之于市场的门外，以为他们是一些不配拥有市场、也没有资本经营能力的看客，而看客们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赖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同情和施舍。



我相信此时此刻有一些人更加看重自身的权力，而不指望那些豪迈的同情。国家能力和个人幸福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的眼光必然要越过国家，越过党派，停留在权力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哈耶克、阿马蒂亚·森、德·索托，还是中国的茅于軾，他们都在强调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还原每个人参与市场的权力，这包括了我们好像又扯到贫穷问题了，这是我关注的老话题。所以我不会错过阅读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的机会。这位被纽约时报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因此他可能不是中国官方欢迎的学者。萨克斯教授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千年计划等重大社会改革项目，对世界贫困问题有深切的了解，指出结束贫困的关键在于让穷人走上发展的阶梯，贫穷并非与生俱来，私人市场力量与公共政策的相互补充，加上更为和谐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才会有能力消灭极端贫困，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表述，我真是心有戚戚。忽然觉得与阅读胡鞍钢、王绍光有一种别样的对比之美。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最近上海的音乐会相当密集，大提琴家麦斯基、小提琴家克莱默都已或将登场，而慕尼黑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也会在上海开演。前者曾经由马勒与理查德·斯特劳斯这样的伟大作曲家们担任过指挥，传奇指挥家切利比达克还从1979年后长期在这里担任音乐总监；后者则是德沃夏克作品的经典诠释代表，如此这些，无法不令人心动。



谈到古典音乐作品的诠释，我一直是好奇与困惑交杂。就拿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六首组曲来说，我手头就有不下10几个版本，有的演奏家单单一人就有两三次录音版本，而如傅尼埃这样的“模范”，甚至多达5个版本。从风格而言，这些演奏家来自于法国、美国、德国、匈牙利以及俄罗斯等地，各自对巴赫的演绎风格均有不同。到底巴赫如何理解他的这六套组曲，我们又如何评判后世的无数诠释，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阅读何尝不是如此。就拿古希腊的那一千哲学家来说，无不是激发起后世无止境的诠释，这些不同的版本到底孰优孰劣，本身对于读者而言就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期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著名自由派学者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9月），尽管这位女性哲学家在国内拥有自己的铁杆拥趸，但是其名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稍嫌陌生。不过在美国思想界，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年与列奥·斯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公开舌辩，并且以一篇《非民主的前景》来为斯特劳斯学派盖棺定论，引起自由派一阵喝彩。她同样也和社群主义大师级人物查尔斯·泰勒论辩爱国主义的问题，面对泰勒的“承认的政治”，纳斯鲍姆却认为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哲人那里存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资源，而这正和现代自由主义天下一家的普适公民认同相联系。本书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善不仅对于古希腊哲学家，还是现代哲学家，都是极其脆弱的，需要某种运气才能成就。尽管我对这位女性哲学家的工作充满了敬意，但是她在序言中将古希腊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相勾联的作法，还是让我感觉到了某些不安。

和纳斯鲍姆从斯多葛哲人那里寻找自由主义传统资源一样，哈里·雅法(Harry V. Jaffa)的《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

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赵雪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则要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挖掘出美国的立国精神。这位“西岸斯特劳学派”的代表认为，林肯与道格拉斯当年关于南北政权的论辩其实就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的翻版而已，前者认为政府必须有一种是非的伦理标准，而后者则认为人民主权（强者的利益）至高无上。不过有人批评雅法根本不理解其师（斯特劳斯）的真意是学色拉叙马霍斯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此看来，斯特劳斯和卡尔·施米特的亲缘性显而易见。最近恰好有**《施米特与政治的现代性》**（魏朝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新鲜出炉，不管是否喜欢施米特，他始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的人民主权到底只是一次政治的决断，还是本身就包括了现代政治的某种确定的价值。



艾伦·布鲁姆的**《巨人与侏儒》**（张辉编，秦露、林国荣、严蓓雯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8月）最近出了修订版。推荐这本书倒并不是因为个人如何推崇斯特劳斯学派，而是因为布鲁姆在此书中发表了大量对当代美国思想人物的评价，如何要了解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分歧，此书颇值一观。比如他对斯特劳斯的纪念文章，甚至更饶有趣味的是他了一篇怀念雷蒙·阿隆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并声称他是最后一位自由主义者，想起同收在此书中他对罗尔斯的攻击性文章，似乎自由主义者对于斯特劳斯学派而言，也有该拉该打之别，其中缘由，或许值得各位深究。



而说起老书重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可谓资格老矣，他的英文版问世之时，我尚未出世，如今时光荏苒，中文第二个版本都已出炉。贝尔的这本名著最早出版于1976年，国内早在1989年也已引进出版，至今一晃18年过去，当年阅读这本书的许多知识青年如今已经不知踪迹，但是这本书的主题却仍然困扰着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前不久据传他将访问中国，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最终没有成行，未能一睹这位当年哈佛大学著名“大炮”的风采，未免还是心留几许遗憾。

哲学著作大多写的晦涩艰深，尽管其内容不乏振聋发聩之处，但是始终让人难以亲近。不过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文体大师”，比如卢梭、尼采等能够读起来赏心悦目、如沐春风。蒙田更算是个中翘楚，当年我疯狂迷上法国的帕斯卡时，常在其《思想录》中看到蒙田的名字，看得出来，帕斯卡以蒙田作为思想的对手。阅读蒙田，当然是愉快的经验，在此推荐这本**《论罗马、死亡、爱》**（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自然是情理当中，值得提及的是，马振骋曾翻译过风靡万千读者的《小王子》，不知道在他看来，蒙田是否就是他心目中的“思想小王子”？

以上种种，基本都是西洋思想，作为中国人，自然会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当下的处境与经验。我少有推荐这方面的书籍，大抵是因为本身来自内地偏远地区，对于许多所谓书籍描写的中国经验往往觉得隔靴搔痒，不得其门。不过这本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10月）却让人感觉到某种亲切。儿时常随父亲奔走于城乡之间，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也感受到基层政治运作的一些行为模式，如今读到一本与个人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的研究著作，不知为何，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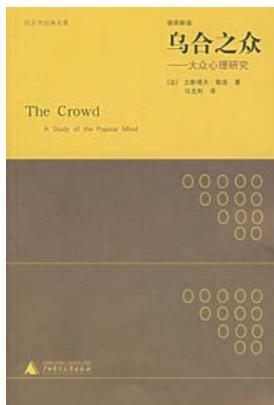


杨绛最近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因为这种名人随笔作者众多，少有引人入胜者。偶尔翻阅此书，让我感觉有趣的是，杨绛居然花了大段篇幅去描述自己的灵魂体验。正好前不久读到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谢绮霞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书中也是大段描述作者的宗教体验。除开是否信教不论，今天的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上，灵魂的体验早就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到底是精神的进步还是沦落？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在阅读报告里, 为了避免信息重复, 我很少介绍再版书籍。但是, 一代新人在成长, 秋天给大一学生上课, 居然有很多出生于 1980 年代的最后一年, 想想不可思议, 掐指一算, 他们确实到了入学年龄, 真是恍如隔世。有些书是时代读物, 事过境迁会自然风化。比如马斯洛的“五种需求层次理论”曾经风靡一时, 现在看来泯然众人。但有些书, 虽然无需日日讲、月月讲, 却需要年年讲。正如王怡先生在推荐《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时所说: “这样的书值得一版再版, 因为一转眼孩子们又戴上了红领巾。有些书的再版速度如果低于教科书, 社会的根基就开始摇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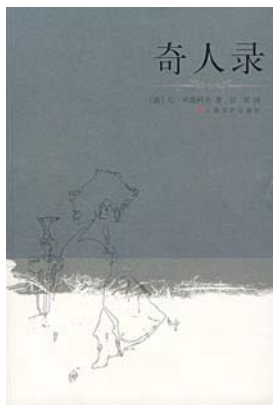


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曾于 2000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冯克利先生在序里透露, 刘小枫先生发现这本书 1927 年就曾由商务印书馆推出, 题为《群众心理》, 译者为吴旭初。这个版本信息未必完整, 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社会学分馆的馆藏书目信息, 吴旭初和杜师业的译本早在 1925 年就由商务印书馆推出, 而且标明是重译。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信息里, 1920 年商务印书馆曾推出此书, 译者也是这两位。关于勒庞在中国的版本信息, 《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的附录“勒庞著作一览表”有较为详尽的整理, 但其中也有一些出入, 具体情况我将另外撰文, 不在这里用“钉钉之学”倒诸位的胃口了。

当时把勒庞翻译成黎朋、勒朋、赖朋等等, 黎朋在民国前后比勒庞在今天更受重视。根据海外学者唐小兵的研究, 他曾经对梁启超、梁漱溟、胡汉民产生过影响。在 1918 年的《随感录三十八》里, 鲁迅也曾引用过他的观点。佟德志发现, 张东荪把勒庞的著作视为“枕中秘本”, 这真是一句绝妙广告辞, 如果把它印在护封上, 说不定印数会暴涨不少。但诱拐而来的读者未必是理想的读者, 比如《乌合之众》揭示领袖打算用观念和信念影响群体头脑时常用的三板斧: 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 这既可以用来破除领袖们的“花招”, 也可能被领袖们活学活用。墨索里尼成为勒庞的忠实读者, 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群众心理学的层面, 埃利亚斯·卡内提(通译卡内蒂, Elias Canetti)《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 对《乌合之众》进行了一定的校正, 两本书可以打包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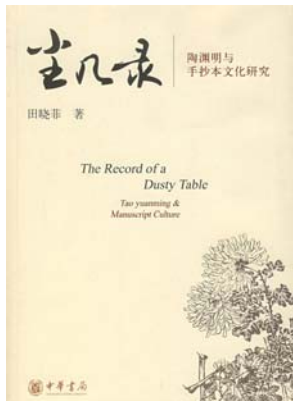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枕中秘本”。《书时光》(三联书店, 2007 年 9 月) 记载了张宗子和他的“枕中秘本”的亲密时光, 这些“枕中秘本”包括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红楼梦》。它们都不是什么海内孤本, 但是张宗子读出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我对张宗子的第一印象, 是他在《万象》上关于《西游记》的文章。他在后记中提到, 自己抄过这本书, 描摹过它的连环画, 整理背诵过其中的诗词, 还爱屋及乌地搜罗过各种续书和新编故事。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象是《水浒传》, 即使在今天, 我对其中不加节制的暴力已经深恶痛绝, 但每次看到那些熟悉的姓氏还是心潮澎湃。可是, 马幼垣的《水浒论衡》、《水浒二论》(均为三联书店, 2007 年 8 月)



出版之后, 我却没有在第一时间拿下。他那本《水浒人物之最》(三联书店, 2006 年) 几乎没有任何创见, 只是用“之最”为噱头。虽然我也知道学术著作和随笔是两码事, 可依然不愿在短时间内再度与这位先生重逢。正如看过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我就对这位英国的张炜失去了兴趣, 虽然他的《恐惧的政治》(方军、吕静莲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选题似乎很有意思, 我却打不起精神。我承认自己固执己见, 同时又会自我安慰, 一个人永远持中稳重, 活得也太累了。在余秋雨之后, 再写散文是可耻的, 尤其是文化大散文或者历史大散文。所以, 我更愿意把张宗子的文字称作随笔, 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除了张宗子, 柯平《阴阳脸》(东方出版社, 2004 年) 也是近年来让人记忆深刻的随笔之一。

提到列斯科夫, 很多朋友会有些茫然, 如果说他的作品是本雅明的“枕边秘本”, 诸位可

能会兴趣盎然，本雅明的名篇《讲故事的人》就是阅读列斯科夫有感而发的产物。列斯科夫早已进入中国，远的不说，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推出《M县的麦克白夫人》（周敏显等译），现在又有了《奇人录》（非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两本分别收入了7篇小说，互有交叉。但是前者在内容介绍中仅是漫不经心地称之为现实主义小说，后者则称他和果戈理一起开创了现代俄语小说伟大的“讲述体”形式；前者仅提及他影响了契诃夫、高尔基，后者则强调他受到本雅明的盛赞。从装帧来看，《M县的麦克白夫人》更像译林出版社而非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风格，用了一张类似剧照的图片作为封面，而《奇人录》的装帧删繁就简，显得非常19世纪。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仿佛两种不同风格，读者“买椟还珠”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三联书店大举推出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的系列之后，他的夫人田晓菲也陆续出版了几种著作，不过她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几乎每本书都会换家出版社，2007年8月中华书局推出她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般的古典文学研究只对作品内容或者作家生平感兴趣，这本书更为关注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里曾经畅想过自己的文学史观，可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实现这个美丽蓝图的除了他本人，恐怕就只有田晓菲了。这本《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充分注意到宇文所安所说，把一部作品放到“话语体系”里，“这个系统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阅读、倾听、写作、再生产、改变以及传播文本的团体”。这不仅需要学术基本功，更需要想象力，而后者是大陆学者最为匮乏的。蒋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斯蒂芬·欧文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放大为：在斯蒂芬·欧文之后，如何从事古典文学研究？

借用一句套话，限于篇幅和时间，有一些书这次不能详谈，只能一笔带过，留待下回分解。它们是赫拉巴尔《河畔小城》（万世荣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9月）、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三联书店，2007年9月）、阿克顿《近代史讲稿》（朱爱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借

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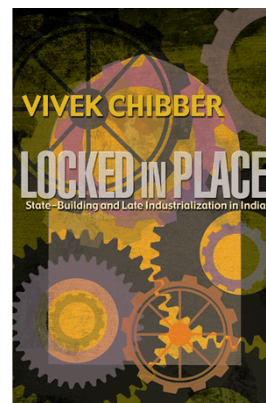
书评·政治与社会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迷思

书评人 张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

维卫科·契博（Vivek Chibber）在这本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巴灵顿·摩尔奖”的著作中试图通过分析印度战后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失败来重构一个关于后工业化国家“发展型国家”的理论。

在传统的解释中，印度独立之后的尼赫鲁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来实现印度的工业化，而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支持集中体现在印度六大民族资本家在44—45年间发布的“孟买方案”，在该文件中他们帮助政府描述了这样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具体细节。然而，契博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显示印度民族资本家只是希望得到政府工业发展计划中的部分优惠（贸易保护、补贴、信贷优惠），却不愿意接受工业计划中对其加以约束的部分。根本原因是印度政府选择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得民族资本和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前者有动力阻挠印度的“发展型国家”所希望扮演的约束民族资本的角色。



在契博的比较研究当中，韩国作为一个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成功案例，其建立发展型国家的成功则恰恰是基于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在这样的战略当中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出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需要而找到了合作的共同语言。

因此，在契博的叙述当中，工业化战略的选择成为决定发展型国家成败的原因，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一般发展型国家研究中的假定正好相反。而对于工业化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契博进一步把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纳入分析：韩国战后在

美国地缘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为日本资本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使得自身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进入国际市场成为可能,而缺乏这样历史机缘的印度又因为国家对本国劳工运动的压制而失去了可能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制衡的另一股力量,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自己国家建设的有效性。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应该是打破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迷思:这个阶级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可以预先假设的:无条件的和谐或是无条件的冲突。这种关系取决于——至少在作者的比较研究里——不同的资本积累方式,而资本积累的方式本身又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的约束,并不是完全由后发展国家自身可以选择的。对于以往通常被笼统地视为一个统一概念的“工业化政策”,作者也给难得地加以细分:工业化政策中的不同层面其实决定了资本的不同利益结构,而这正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希望有选择地支持、参与印度工业战略的根本原因。

和早期“发展型国家”研究往往集中在“国家能力”这单个方面的倾向不同,契博把研究的关注转移到国家和(民族)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印度建设发展型国家的失败不再是归咎于缺乏有效的官僚体系和国家机器内部的协调统一,而是国家目标和民族资本目标之间的不和谐。相反,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工业化历史也在作者笔下得到重新阐释:不再是一个强势、全能的政府如何有效地控制国内资本、实施自己工业化的宏伟计划,而是国家机器和资本之间如何就工业化战略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

作者虽然没有试图提供关于晚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一个一般的社会学理论,但是在他两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背后隐含的那个理论倒是不难看出:一个致力于工业化的国家(有力的官僚体系、国家机器内部关于产业政策有效的协调、尤其是一个权威的全能部门的存在)加上和民族资本之间形成关于工业化的共识、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如果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允许这样的策略,并且国内劳工对于民族资本能够构成有效的钳制。但是,这样的思路和类似的“发展型国家”研究所共有一个问题是:它几乎不触及国家如何可能准确选择产业政策的对象、如何准确预测国际产业转移的顺序;关于工业化“共识”的达成成了“发展型国家”的标志,似乎“共识”本身就能保证工业战略的成功。如果超出印度和东亚经济,读者应该不难找出国家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共识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一败涂地或是这种共识就是没有找对工业化目标的反面案例。而这种国家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共识”、“合作”如何和“裙带资本主义”、“寻租”之类的概念划清界限,也是作者必须要应对的问题。

在作者的理论框架里,劳工运动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和国家联盟牵制民族资本阶层,迫使后者在国家的工业化计划中采取合作的态度。作者在对印度历史的再叙述当中对于印度国大党如何分化、节制劳工运动有详细论述,但是在他的比较案例中,契博对于同时期韩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工的地位几乎没有触及。给定学界一般的共识是韩国军人政权对于国内劳工运动长期采取严酷压制政策,契博的比较框架因此显得有些残缺不全。尤其是考虑到契博笔下暗含着对一种更加社会民主化的晚期工业化模式的强烈期待和认可,契博这个疏漏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by Vivek Chibber, 200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书评·政治与社会

巴黎,何以为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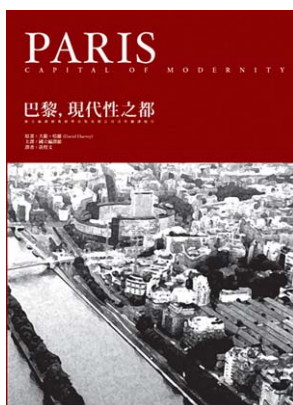
书评人 严飞 (香港, fei.yan@green.oxon.org)

对每个人来说,我们时代的巴黎,就是他的巴黎,比起帝国时代来,也许今天就更是如此。

—— 奥斯曼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

曾被德国思想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赞誉为“十九世纪首都”的巴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以摄人心魄的历史魅力,凝聚着人们对这座城市如梦又如幻的爱恋与向往。

然而,当世人纷纷帖上本雅明的标签,以都市漫游人 (flâneur) 的姿态流连于那些散发着破败气息的旧区街角,痴迷



于帝国殿堂前的班驳石道与雕像，深以为自己倒退回老欧洲文明的秩序中心时，这本书的作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却将巴黎称为现代性的首都，并将其现代性的演变，推演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巴黎，究竟是旧欧洲的象征，还是现代都会的典范？

1848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当时军人和农民对拿破仑近乎迷信的崇拜心理，在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胜。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在“皇帝万岁”（Vive l'empereur）的呐喊声中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帝国，翌年自封为帝，史称拿破仑三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三世登基后的首要政策就是发动巴黎大改造。这位在本雅明眼中“受到命运眷顾而踌躇满志的人”，在整治巴黎的蓝图下雄心壮志，甚至多次亲临市政厅公开演讲，强调“我们将开辟新的道路，并且改善人口密集区和光线缺乏的问题，我们让阳光照射到全城每个角落，正如同真理之光启迪我们的心智一般。”

拿破仑三世的巴黎大改造不无道理，因为此时期的巴黎，还是一座人口稠密、乌烟瘴气的中古城市，毫无耀眼而骄傲的帝国荣光。特别是在经历过几度革命和动荡之后，整个城市一贫如洗，显得疲惫而老旧，社会治安败坏，公共卫生也岌岌可危，排水系统又非常简陋，一旦下雨，路面立刻积水。而刚刚经历革命的巴黎市民，因饥饿、失业、过度劳动而向往着新的秩序与富裕。另外一层更为关键的动力，则是逼仄狭窄的街道和蜿蜒缠绕的环状路网，极易成为街头示威及起义时设置路障的天然壁垒。因此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里，改造的一个潜在目标，就是拓扩宽敞笔直的道路以使入城镇压市民起义的马队通行无阻，也便于炮击，因为“炮弹不懂得右转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脱胎换骨的惊人转变开始在巴黎上演，而主导并执行这场大戏的，就是大卫·哈维笔下的灵魂人物——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生于1809年的奥斯曼，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在被拿破仑三世这个“伯乐”发掘之前，他还仅仅是名巴黎市警察局长。1853年，拿破仑三世将奥斯曼招至身边，任命他为塞纳省（Seine département）行政长官（préfet），负责改造并重建巴黎的重任。

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之下，奥斯曼毫无阻碍地圈占被改造地区的商业用地，推倒传统居住区，将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逐往郊区，并将拿破仑三世眼里那些街垒战和造反温床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彻底的都市空间改写。从1853年起至1870年第二帝国终结，巴黎共拆除了2万多栋建筑，修建了总长137公里的数条林荫大道（包括奥斯曼大道，这些两侧栽植了高大成片树木的大道成为日后世界所有首都和大都市道路建设的楷模）、总面积达2000多公顷的公园和九座横跨塞纳河的桥梁，3200盏瓦斯灯彻夜照亮着新建的主干道，不久，这样的灯泡又照亮了连接卢浮宫与各个住宅区的街道。经过奥斯曼的大刀阔斧，一个以大凯旋门为中心，贯穿东西南北的大型道路轴线以及两圈由内环路和外环路组成的环形道路系统落成，并由此奠定了现代巴黎交通的基本格局。

奥斯曼在改造巴黎的城市面貌之外，还对城市的辅助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为巴黎留下一副完整的现代都市骨骼。巴黎的排水污染问题一向令人棘手，为此，奥斯曼铺装了800公里长的给水管和500公里长的排水道，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供水和排污、排水系统。1854年，奥斯曼又在市中心建设中央大菜场，成为当时整个欧洲地区独一无二的大型城市中央菜场，几乎满足了整个巴黎市区的蔬菜、水果、副食和肉类的供应，与此同时，总计570匹马拉动的公交马车也相继投入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得到改善。在他的领导下，巴黎还兴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包括新的图书馆、法兰西美术学院，以及著名的巴黎歌剧院；大量的百货店、时装屋、餐馆和娱乐场所纷纷落成，一并形塑出今日巴黎独特的城市氛围。

奥斯曼巴黎城市改造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根据意大利建筑学家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在《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中的记载：“在同一时期内，巴黎的人口从120万，几乎增长到200万；同时巴黎拆毁了约2.7万所旧住宅，新建了10万所新住宅；法国公民的平均收入约从2500法郎增加到5000法郎，巴黎社区的收入从20万法郎增加到200万法郎。”在数字的背后，巴黎脱胎换骨，从一个中世纪风貌的城镇，蜕变为一个现代都市，就像本奈沃洛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整个城市当中，一个技术和行政管理的综合规定第一次通盘形成并付诸实施。”

然而，虽然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是一项脱离中世纪风貌以实践现代城市理念的空间创举，但那种对旧巴黎毁灭性的拆毁却一直被后人所诟病。本雅明就抱怨过，认为奥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来只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碑”；流亡在

外的雨果被问及是否怀念巴黎时,更是宣称“巴黎只是个概念”,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不过是一堆“利佛里大街(Rue de Rivoli),而我向来憎恶利佛里大街。”而在不少当代城市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奥斯曼无疑是“粗暴地折断了巴黎历史”的刽子手。在他大刀式地挥砍之下,巴黎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贫穷区域和富裕区域也被彻底的分化。

不过,批评和指责之外,就连本雅明也不得不承认,奥斯曼的改建工程“使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奥斯曼出现的时间点,正是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历史当口。政治力配合着资产阶级利益,使得商业经济成为了城市的驱动力量。那些本意用来镇压暴动与骚乱的大马路,成为了展示资本的绝好地点。许多风雅的店面得以容身,琳琅满目的商品被煞有介事地摆放在明亮的橱窗里,原本匆匆路过的行人摇身一变、晋身为悠闲游逛的顾客,其结果,现代大众消费文化悄然兴起。

在这里,巴黎的变身过程,就是哈维所谓的“空间关系的转变”。在哈维看来,奥斯曼所主导的城市外在形态改造只是巴黎走向全面现代性的一个诱因,而真正的内因,乃是这些改变所带来的崭新的社会物质与社会影响。巴黎的新空间透过国家、金融资本与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导致生产与劳动状况发生变化,从而诞生出新兴市场与消费主义。新的共同体与意识形态就此逐渐形成,并塑造出一个与旧巴黎断裂的新巴黎。

例如,在奥斯曼强迫巴黎走入现代之前,在文学领域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缪塞、拉马丁、乔治桑,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歌,如福娄拜与波德莱尔。改造之前,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现实的管理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前只有小作坊或店铺沿着弯曲狭小的街区巷弄开张,之后宽阔的大马路旁出现了巨大的百货公司与流行名品店,每家店面都有橱窗陈列商品,外面也有瓦斯灯照亮路面;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只是散步各处的纯手工业者,之后绝大部分手工业则被机械或现代工作所取代;甚至,在奥斯曼动手改造之初,运水人在巴黎还是个十分重要的职业,但到了1870年,随着地下水道的完全铺设和自来水的普及,运水人几乎完全消失。

另一个例证来自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他在其代表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中对巴黎忧郁气质的源头进行了一番有趣的探索。马歇尔认为,奥斯曼着力打造的林荫大道,是“19世纪最为辉煌的都市发明,是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突破”,因为林荫大道,以及连绵而去的小广场、喷泉、雕塑、纪念碑,都为巴黎居民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活动场所,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活中汲取艺术层面上的灵感。

“所谓历史,就是一个时代从另一个时代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瑞士艺术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如是说。从这层意义出发,哈维不仅指出了巴黎何以成为巴黎,更是在巴黎与现代性的辩证纠葛中,为我们认识现代性之都,如纽约、东京、香港,乃至上海和北京的城市改造与影响,提供了比照的重要视角。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巴黎,现代性之都》,黄煜文译,群学出版社,台北,2007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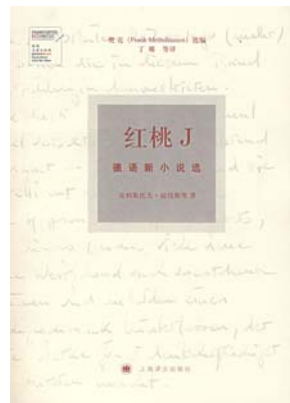
书评·文学

德国新生代文学:可以写诗的一代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在中国提起‘德国’,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啤酒、足球、西门子或是宝马车,很少有人想起思想深邃而又有趣的德国当代文学。”这是《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一书的编者,德国人樊克(Frank Meinshausen)介绍德语当代文学的初衷。如果要打破中国读者的这种习惯看法,领略当下的德语小说,《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惟一的选择。

这本小说选集收录了生于1955—1975年间的德语作家作品共24篇,也是一幅德语新生代作家的群像,这些作家包括已经有中译本的克利斯托夫·彼得斯(《夜幕》)、尤迪特·赫



尔曼（《夏屋，以后》），访问过中国的托马斯·黑歇特。当然还有更多不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德国青年作家。读 24 篇小说，会感到强烈的不同，首先是“新小说”的说法，容易让我们联想起罗伯·格里耶、布托尔等人之于法国文学的意义，但这本《红桃 J》没有全新的文学理论，没有统一的文学风格，也没有强烈的文学实验性，它仅仅意味着这 24 位作家的作品代表了新一轮的德语文学产量，这个“新”更多是关于时间的。至少在这本《红桃 J》里所表现出的当代德语文学，其文学方法并没有改变，更多的是就 1989 年以后德国社会环境的更改而引起的表达更改。

但并不是说这群作家仅仅是继承了德国的文学写作。2006 年到过中国访问的德国女作家朱丽·泽曾说“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今年参加 BIBF 的德国作家则说“作为我们父辈的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一代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伯尔他们那一代作家”。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为什么是伯尔而不是格拉斯？依我浅见，伯尔对于现实的关注要强于格拉斯，比如，如果我们试图了解战后德国，至少可以读一读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而在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回忆录里，我们则可以读到伯尔造访捷克的故事，他关注当时政治重压下的捷克作家群体，可以看出这位德国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忧虑所在。前不久，中国文学界都很熟悉的汉学家顾彬先生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其中谈到当今德国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对二战以来历史反思的漠视，可以作为文学的现实佐证。所以德国青年作家们这种力图强调“与他们不同”的惊人之语与其说是“打倒父亲”，不如说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其实是扩大了读者的视力范围，而不再局限于著名作家的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群作家的作品，有的尽管只是长篇节录，却弥补了文化交流缺失引起的偏差。

德国社会文化史家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在其回忆录《海德堡岁月》里追述了二战之后德国凋敝的社会现状，但是真正的优秀分子，无不发愤思变，试图从刚刚结束的人类浩劫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桑巴特以及他所写到的在海德堡用功的年轻人，他们认真地反思历史，尤其是自己的国家对于二战的罪责承担。如何重建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格局，他们会倾心于文化社会学宗师阿尔弗雷德·韦伯及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大师们“整理国故”的苦心，而对如施密特这类大师的思想持极其怀疑的态度。总的来说，在 1950 年前后，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重建是那个时代里德国人共同承担的，这个母题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所着力表达的。但应当看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母题，“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的说法未尝不是桑巴特之后德国人对于二战罪责过度的一种反应（这与之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拒不承认大屠杀则应区别看待）。众所周知，二战之后的由德国开始的世界“铁幕”格局、1989 年之后的德国统一乃至全球化浪潮，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拷问历史固然重要，但现实问题更值得深思，目前在德国畅销的小说《延森先生遁世记》，延森先生之所以要“遁世”，因为他受不了日益快速化发展的现代社会，至于沉重的历史负担（二战原罪）早已不再是困扰这代人的问题，即使是关乎二战的历史题材，他们也尝试了不同的手法去表达，超越了主题先行的习惯套路（比如涉及纳粹历史的《杀心萌动那一年》）。也可以说，正是朱丽·泽等人的呼声，唤醒了人们（从这些小说家在德国的出版情况看，他们的确是表达了自己时代的生活主题，只是国外读者不了解而已）去关注君特·格拉斯以外的德语文学，必须指出，德语文学的概念远远大于德国文学的概念，德语文学中既有格拉斯这样的作家，也有耶利内克这样的作家，还有诸多写其他主题、其他风格的作家。

第一篇《在湖边》节选自德国女作家费里希塔兹·霍佩 1996 年的处女作《理发师的野餐》，干净，诗意，是一篇让人想读全本的小说。但整本小说选的气质（或者说选编者的标准），应该是以克利斯托夫·彼得斯的《红桃 J》为代表。彼得斯的长篇小说《夜幕》已经有中译本，《红桃 J》和《延森先生遁世记》甚至聚斯金德的《鸽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极重视小人物的生活碎片，并且试图从中提炼出某种反宏大叙事的细节。银行守门人约纳丹被一只鸽子扰乱内心的平静，延森先生一步步从社会不跟他玩到他不跟社会玩，机场的保安人员克罗伊茨博士却被地铁站的神秘女人所迷惑——尤其是后两人，表面看来是人的故事，其实打底的是社会现实，汁白当黑，对这些人生活的描写占去了很大的比重，阅读这样的小说，可以从侧面看出德国的现状。虽然文学并不是描绘世相，但无疑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在德语文学中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

《足球的感悟》有一个不是一般平庸的标题，但小说却真是好。一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印刷工买房子的故事，与妻子、与邻居以及他舍不得的女儿的故事——女儿去纽约学日尔曼文学，这在他看来太莫名其妙了，而他妻子迷上了日本茶道，还依着风水学折腾家里的家具，让主人翁发狂，一回家就叫：“电视在哪里？”这些故事都包含在他所钟爱的足球转播里。这篇小说好就好在有小说的氛围。作者拉尔夫·罗特曼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自学成才，从 1984 年出版诗集以来，出版了不少小说，获得过德国的各种文学奖。

和新生代的其他德国作家相比，拉尔夫·罗特曼的经历并不出奇。《当爱情迸发时，五颗心在跳动》是一篇极痛快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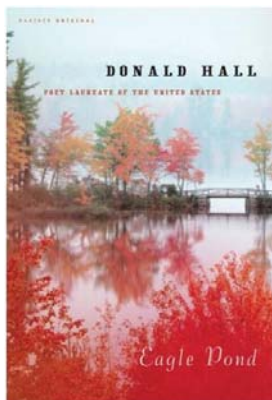
说，语言之好让人坚信翻译损耗了不止一点点。生于 1964 年的小说作者费里顿·蔡默鲁格在德国以语言独特著称，本书的编者樊克就认为他语言独特很难翻译。费里顿·蔡默鲁格是土耳其裔，但长于德国，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写小说之余还从事剧本写作。身份认同是当今世界文学一个潮流般的标识，德语文学本身就具有这种身份认同，但德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其经历之丰富远远不止移民与乡愁。除了东西德统一的差异性，除了费里顿·蔡默鲁格这些的外来族群，还有如《收集世界的人》的作者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他生于保加利亚，先后在肯尼亚、德国、孟买、开普敦生活，和他笔下的主人翁理查德·伯顿一样，是个世界公民。尽管都可以归结到“身份认同”的大旗下，这些不同身份的德语作家却在突破了常见的写作模式，他们的作品在呈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时，也呈现了不同的文学风格。对移民文学多有批评的奈保尔如果看德语文学，应该不会如批评他的印度同胞那般言辞激烈。

感谢康慨先生提供标题。

【德】樊克选编、克利斯托弗·彼得斯等著：《红桃 J：德语新小说选》，丁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 8 月，25.00 元。

诗人霍尔

书评人 马慧元（美国·休斯敦，huiyuanma@gmail.com）



2006 年，美国桂冠诗人的荣誉授予了出生于 1928 年的老诗人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至 2007 年，霍尔已经出版了诗集和散文集各十几本。霍尔曾在密歇根大学教书，后来辞职，跟第二任妻子长年居住在新安普郡的农庄，一住几十年。原因很简单，农庄是祖父买的，他的童年在这里度过。从十二岁的时候，在这里开始写诗。

最新出版的这本散文集《鹰池》(Eagle Pond) 有点类似于 E.B. 怀特的风景散文，其坚决隐居的态度又跟梭罗类似，不过深度和力量都不及前两者。但是，梭罗毕竟只隐居了两年，而霍尔的隐居则有几十年，虽然那不是真正的隐居，只是一个远离都市生活的作家在乡下的生活，周围有邻居有文明有社交。以美国之地大物博，找到个清静地方自给自足并不停发表作品，实在不算出奇，但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和国家，过于单一的生活总会影响人的视野，而远离都市，是否一种逃避呢？当然，居于清静之地并不意味远离烦恼和痛苦，因为人至少无法逃离亲人和自己的肉体。

霍尔快五十岁的时候跟比他年轻二十岁的珍妮(Jane Kenton) 结婚，一起搬到这里。妻子也写诗，可惜一直无名。直到 1995 年，她的作品终于慢慢获得了一点承认，这时却被发现得了白血病。在此之前几年，快七十岁的霍尔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只有三分之一的存活希望，而终于击败了几次病魔的进攻活下来。然而幸运总不可能常在——珍妮十二个星期后就死了。这个时期内两人心如刀割的牵挂和挣扎，记录在 1998 年出版的诗集《没有》(Without) 中。“没有” 一词，让人想起诗人毕肖普的名作《丧失的艺术》，但这本集子实在太过直白，没有想象力。

霍尔这本集子中的诗是散文体，没什么韵律，只有安静、下降的尾音，内容则直抒胸臆。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住院和生活的报告。悼亡虽然是私人情感，但如果对他人有所担当，印出来给人看也是可资怀念之事。然而读者终究是冷血的，你的亲人再可恋，你的悼亡诗文还是被当作文章来读来批评。一本平淡的纪念诗集仍然是让人同情的，只是它实在没有必要成为出版物。当然，诗中还是有一些动人的瞬间，“我的内心，就象一个四岁的孩子，相信自己如果很乖，不受责备，她就不会离去。（《陶瓷夫妻》）”“他给她一个粉红的戒指，宝石被九颗小钻石环绕。她立刻为之取名，‘请不要死。’（《给露西的歌》）”。珍妮因为化疗，头发脱去，脸庞浮肿，脾气变坏，抑郁，想死。一首首诗琐碎地记录了一切。

散文集《鹰池》仍然有部分文章以夫妻在农场的生活为主题，不过哀愁淡得多了，而且写景忆旧都过于写实、板滞。霍尔在前言里写道，我住在祖上的农场里，快乐地感觉着我跟历史的温暖联系。仅此而已，全书实在没有更多要说的了——其实，居于乡下，在美国人中并不少见，写来极易流于平庸，除非有不凡的经历和想法。霍尔一本又一本写类似的景物，不但有很多重复，而且令他的想法和眼界不够宽广，虽然随着一本本诗集散文集的出版，技术和语言磨炼得越来越好。比如就细部而言，诗人对普通事物的观察，到底有些不凡之处，尤其是年复一年的专心生活，令作者真是心如静水，能以巨大的耐心追

随四季变化,笔下充满刻意选择的色彩。喜爱大自然的读者,也许会被其中跟土壤的亲近感所打动。但作者“桂冠诗人”的身份,难免让人期望过高而有几分失望,尤其是,他实在无法让你有惊艳之感,你必须用巨大的耐心接近他的大量作品,才能在其中发掘出闪光点。

赞美霍尔的作品的同行、评论家也还是不少的,主要集中在他的宁静的风格上。而他的批评者之一斯诺格拉斯(W. D. Snodgrass)在《多变的艺术家唐纳德霍尔的不变之处》一文中,说到霍尔对他本人有很深的知遇之恩,霍尔的大力推荐令他摆脱无名和贫穷,然而,多年来他实在无法喜欢霍尔的诗,至少是他早年的诗。斯诺格拉斯委婉地批评霍尔的诗作平庸、无趣、僵硬,拼命写作和编辑各种东西以维持生活,等等。当然,霍尔的诗歌和散文,在中年之后是越来越好了,但我读来的感想还是跟斯诺格拉斯相似——平庸。除了以田园生活作为持续的卖点,他几乎一无所有。

Eagle Pond, by Donald Hall, 2007,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

书评·文化

哈“不良”——时尚文化的原动力

书评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当日本经济结束战后初期的重建,正稳步迈向高度成长期,乃至日政府在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踌躇满志地宣告“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时候;翌年,当著名“毒舌评论家”大宅壮一以不无夸张的腔调预言电视媒体将把日本人“一亿总白痴化”的时候,“亚文化”(Subculture)开始作为一个学术词汇进入日本,而真正成为表现战后东洋市民社会特质的“关键词”,则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情。

所谓“亚文化”,亦称“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在今天现代日语中的语境是“与真正权威的高级文化及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相对应,是面向年轻人的作品和内容”,其内涵大致相当于年轻人文化或“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既然是“亚”(Sub),那么其原意中自然包含“下位文化”之意,即古典音乐、古典艺能、纯文学、纯艺术(Fine Art)等正统、高级文化之外的艺术,传统上也曾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语而使用。

这个词汇在现代话语中的咸鱼翻生大约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5年,好莱坞电影《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和《无理由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在日本上演,主演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顷刻间成为家喻户晓、大红大紫的明星;同年上演的另一部好莱坞影片《暴力教室》(Blackboard Jungle)中的主题歌《Rock Around The Crack》,更成为风靡列岛的热曲——此为被称为“Teenager文化”的美国流行文化最初登陆日本,在保守的东洋社会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西化“新浪潮”之滥觞。

1956年,描画拥有“老爹给买的车”的富裕阶层子弟生活方式的流行小说《太阳的季节》出版,一炮打响,当年即创下28万册的发行记录,其作者、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4岁荣膺“芥川文学奖”,跻身新锐小说家行列。作品旋即被“日活”(Nikkatsu Corporation)拍成同名电影,由作者的弟弟、早夭的天才明星石原裕次郎主演,轰动全国。作品描写了一群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不良少年青春期的“喧哗与躁动”:湘南叶山的避暑山庄、逗子海滨的游艇码头、郊外别墅的舞会、银座林荫道的猎色……成为东洋社会“迷惘的一代”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战后初期像工蜂一样勤勉工作的上班族们在惊异于居然有如此不求上进、玩世不恭的“社会精英”(那还是大学生被视为“精英”的时代)的同时,也不由得被那些年轻、健康、充满生命活力的性爱情节所吸引。

石原兄弟作为“太阳族”的代表,以这种令父兄们感到尴尬、突兀的方式,宣告了一个消费型社会的来临。从此,日本经济的“新干线”驶过“神武景气”(1955-57年)、“岩户景气”(1958-61年)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路驰骋,直奔东京奥运会。仿佛一夜间,全国的大街小巷冒出无数留“慎太郎板寸”、戴墨镜、穿拖鞋,走路像瘸子似的拖着腿,绝不屈膝



的不良少年。在大众传媒的造势下，“太阳族”成为高成长初期日本社会一道独特的世相风景线。

1964年，在东京银座的“Miyuki”大街，出现了一些着装时尚的年轻人的身影。跟外表上故作浑浑噩噩状的“太阳族”相比，这一群相当绅士淑女：男性一律美国东海岸长春藤名校“Ivy”风格装束，分头、眼镜、皮鞋，格西装、细领带、深色长裤，显得知性文雅、气质高贵；女性则效仿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的《你好，忧愁》(Bonjour Tristesse)中女主人公赛茜尔(Cécile)的装扮，披肩长发用手帕轻束，连衣裙的裙带在腰部打结，赤脚穿橡胶凉鞋，拎着像麻包一样的大袋子，里面塞满了化妆品和换洗的衣物，透着适性、随意和“波希米亚”的调子——这是于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生的、所谓“团块世代”的粉墨登场。这份堪称模范的美东海岸加欧陆风的精心别致，简直就是从彼时流行的时尚杂志上走出来的一群时装模特。

当“Miyuki族”的少男少女们三三两两徜徉在银座——这条被看成是成人世界中最高贵、最繁盛的大街，以青春美貌和摩登时尚装点着那些珠光宝气的橱窗、拱廊的时候，他们仿佛在向世人宣称：这里，是我们的T型台，是我们猎艳的竞技场。

从“太阳族”到“Miyuki族”，可以看出青年亚文化从“阶级”到“世代”的推移开始加速。就对性的态度而言，相对于只把女性当成是单纯的性行为(Sex)客体的“太阳族”，“Miyuki族”在渔色时，主导权也可能在女性一方。对此，1975年9月9日出版的《周刊花花公子》上，日本风俗评论家矶野荣太郎评论道：“作为评价族的基准，决定性的是看他们留下什么。太阳族解放了性，六本木族、原宿族带来了乱交，地下族产生了新艺术，而Miyuki族则创造了欺骗男人的技艺。如此看来，太阳族和Miyuki族不愧是战后的两大族系。”

如此，作者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对战后各个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般轮番出场的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种族”细加研究，以类似田野调查般的实证手段，分别从阶级、媒体、世代、性及场所5个视角出发加以考察、分析，相当程度上复原了战后日本社会亚文化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得以像地质学者观察地层构造似的，按时间的顺序，对由多达11种亚文化构成的“层累构造”的“物理”形态做深层扫描：“疯癫族”、“暴走族”、“水晶族”、“御宅族”、“涩谷系”、“新人类系”、“Ko-Gal系”、“里原系”，等等。

作者观察青年亚文化何以从“族”演变到“系”的着眼点，颇耐人寻味。上个世纪60年代，经历过战争的世代与战后世代之间有难以弥合的鸿沟。以此为背景，试图从以老一代的人生经验为主导的所谓“社会共识”的桎梏中脱离的年轻一代，很容易彼此找到相通点。以这种相通点为共同纽带，“××族”便应运辈出，如雨后春笋。但是，进入80年代后，代际差异变小，富足的生活使年轻人在讴歌并积极融入消费社会的同时，被同构化，青年文化也被稀释，作为“反弹琵琶的精英主义”的反体制角色似乎也被忘却。所以，当人们说“年轻人”时，不复有特殊的意味。因此，90年代登场的被称为“××系”的亚文化“种族”，从一开始即带有某种暧昧色彩，其结合已不再像早期的“族”那样基于对共同纽带的自我认知，而是基于时装、时尚杂志及市场专门家们所教流的流行要素的“站队”行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对抗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战后青年亚文化，在走了一个圈子之后，似乎又回到了起步的地方。不同的是，这次所面对的，除了当初拼死对抗的社会既存秩序所强加的东西之外，还多了一个自身的衍生物——其血缘虽然来自亚文化，但却高度体制化、权力化，几乎“进化”成了另一种“主流”。

发轫于战后初期的青年亚文化，几乎与日本和平建设的历史等长，取得的成就也相当，可谓以“不良”、“解构”始，以“有趣”、“建构”终。今天，那些曾几何时被目为“非主流”的“亚”文化“物种”(如动漫、电玩等)，不仅成了当然的“雅”文化，是所谓“酷日本”(Cool Japan)的魅力所在，甚至构成了日本在21世纪赖以生存并做大的重要软实力(Soft Power)。

谁成想，风靡全球的创意产业、时尚工业，竟源自一群“不良”少年的“恶搞”。

《族的系谱学——青年亚文化的战后史》(『族の系譜学——ユース・サブカルチャーの戦後史』): 难波功士 著, [日] 青弓社, 2007年6月。

书评·艺术

小提琴艺术的传薪人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卡尔·弗莱什(Carl Flesch)对于业余爱乐者并不算太熟悉,因为作为演奏家而言,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录音。事实上,他当年曾经和发明第一台留声机的爱迪生合作过 40 余张唱片,其中不乏热卖之作,但是他对这些录音并无好感,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演奏水平,只不过是应付唱片工业的产物,这也使得我们并无太多机会亲自感受弗莱什的演奏魅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名字对于音乐学院的科班学生而言,简直有如一座奥林匹斯山,让人敬畏,这则归结为弗莱什在教学方面留下的丰厚遗产,他所写的《小提琴演奏艺术》、《小提琴指法概论》至今仍然是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技巧的经典读物。

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来说,弗莱什不仅留下了经典教材,培养的学生也是名满天下,比如哥尔德堡(Szymon Goldberg)、谢林(Henryk Szeryng)、哈西德(Joseph Hassid)以及内弗(Ginette Neveu)等等,包括如今大红大紫的穆特(Anne-Sophie Mutter)也曾短暂的受教于弗莱什门下,所谓桃李满天下,弗莱什可以说当之无愧。

这本回忆录是弗莱什在世时完成的,时间到 1928 年为止,实际上他之后直到 1944 年才去世,他虽然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却未能看到二战的落幕,而且他更不会知道,他的得意女弟子内弗会在 1949 年赴美途中因空难而丧生,而就是这位法国女子,在 1935 年的华沙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上击败了后来雄霸小提琴世界的“大卫王”——奥伊斯特拉赫。笔者曾听过她录制的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乍听之下,就有惊艳之感,可惜天不假年。

这本回忆录的文风平心而论并不精巧,他对于过往的回忆与对他人的点评都极为坦率直接,有时候会让读者有读流水帐之感。但是略知小提琴演奏史与 19 世纪末期的音乐文化史的朋友,都可以从这本回忆录中读出不少的惊心动魄,因为象萨拉萨蒂、伊萨伊和约阿希姆这些小提琴演奏大师,我们大多只能眺目远观,而 13 岁的弗莱什就亲身感受过约阿希姆的演奏,他也曾经亲眼目睹过身为同龄人的克莱斯勒的天才成长过程,这些都让这本回忆录不再是个人的孤芳自赏,而是以他一人之眼带着我们回顾了那一个让人心澎湃的欧洲艺术的转折过程。

作为音乐教育家和演奏家兼一身的弗莱什,他对那一个时代中的许多音乐家都有相当直率的点评,而且并非是泛泛之论,而是从那些人的性格、教育经历、演奏技巧等方面来分析他们成功或失败的症结。虽然这些分析有时候让我不免有些厌倦,毕竟以“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评价艺术家未免太过残酷,但是弗莱什的高度自制力也使得他总能以一种同情性的理解去观察他的前辈、同侪及后辈。比如他对克莱斯勒长达 8 页的分析,让我在仰望之余,也得以客观了解到克莱斯勒的演奏与个人生活的细节,这种分析有可能让我们超越简单的崇拜,从而有可能从这些名家身上获得一些对自身有所助益的东西。

这种审慎节制的性格让他不仅在演奏方面能广采各家之长,而且对于他的学生,他也是相当的小心,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曾目睹了师长们的随意毁掉了无数颇有天资的学生,也看到了奥尔这样的只能培养天才的教师的方法上的缺陷,因此当在教授内弗时,他只在纯粹技术上给予帮助指导,而不在性情与天赋上强迫其改变。

对于演奏小提琴的朋友,这本书无疑可以提供一些音乐成长的经验,对于笔者而言,弗莱什笔下所描绘的维也纳、柏林、巴黎、阿姆斯特丹的音乐氛围,则更为让我着迷。他让我们了解到克莱斯勒、蒂博、卡萨尔斯、尼基什在一个精英文化开始衰落的时代中的风采,他也早早预料到福特文格勒的远大前程,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在 1910 年,弗莱什曾和他合作过一曲勃拉姆斯的协奏曲而已。

回忆录中让我最为深刻的一段是他对当年德国革命的描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弗莱什没有头脑发热,而是敏锐的察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艺术带来的影响,他说:“在我看来,多少世纪来一直依靠超一流的天才们注入生气的音乐文化将要屈从于一股呼吁平等的狂潮,屈从于一种每况愈下的趋势,这种趋势将使任何出类拔萃的事物无立足之地。”

感谢弗莱什,说出了我欲说而不能的心里话。

卡尔·弗莱什：《弦歌生涯：卡尔·弗莱什回忆录》，筱章、孙予译，文汇出版社，2001年5月，定价：22元。

译介

世纪播放列表

杰尔夫·戴尔 (Geoff Dyer)，翻译：陈丹丹 (南京)

能写书评的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事实上这种人正是此书的目标读者--会不会反而让他不适合这个工作呢？我这么问，不是因为自己“精通古典音乐”，而是我对这个“文化边缘难解的喧嚣有着一时的好奇”。那些精通音乐的人恐怕会扑向艾利克斯·罗斯，这个《纽约客》的音乐评论家，假如他把什么东西弄错的话--比如把 D 小调的乐曲说成了 D 大调-但正因为我对音乐技术不了解，才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深入地检验罗斯的才华。面对我这种病人（这么说起来似乎是很恰当的）时，罗斯就像一个治疗医生，遇到了无法自愈的疾病。他的作品得作用于周围的肌肉，以医治这深入骨髓的病患。如果他能够这么做--如果他成功地解释清楚我听到却无法理解的东西--那么，他准能推出一个令人分外振奋的康复计划。

《剩下的是噪音》是一本涵盖极广，极具野心的书。其宗旨不仅仅是做一个关于 20 世纪古典作曲界的调查，而是展现从音乐中折射出的 20 世纪史。我们从古斯塔夫·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开始，这两位德奥音乐的巨匠在 1906 年 5 月 16 日聚首格拉茨。施特劳斯准备在那儿指挥他的歌剧《莎乐美》。那场演出是令人难忘的--倒不是它因为尖锐、刺耳、不和谐的音乐，而是因为观众们都喜欢这部歌剧，这令马勒十分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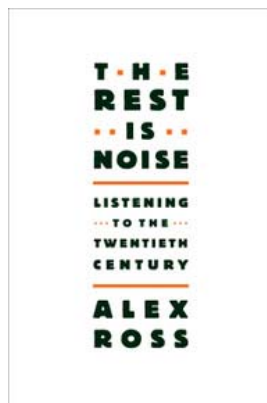
这也许只是“繁忙演出季中的一个偶发事件，然而它像闪电一般，照亮了处于巨变边缘的音乐界。过去与未来正在碰撞；从前的几个世纪在那个夜晚终结。”这一事件经生动的描绘，深入精准的分析，成为了全书的写作范式。罗斯不断地找出那些反映宏大运动的事件--一个人或一个场景，潮流与意义于此交汇。在巴黎，克劳德·德彪西和埃里克·萨蒂代表着“彻底的，基于民众的，迷恋爵士乐”的先锋派，而在维也纳，阿诺德·勋伯格及他的十二音体系的追随者，安东·韦伯恩和阿尔班·贝尔格，则“用他们的圣火照亮可怖的深渊”。

从斯特拉文斯基到西贝纽斯再到勋伯格（此君“订阅百科全书以学习曲式，所以在收到字母“S”开头的那一卷书前，没法创作奏鸣曲（Sonata）”），这些新音乐的重量级新星以简洁而富有信心的笔触描绘出来，显然是罗斯深入浸淫、研究的成果。尽管罗斯对西奥多·阿多诺和托马斯·曼颇为苛刻，他自身的风格却成功地摆脱了托马斯·曼在《浮士德博士》（该小说在框架上与此书前半部分类似）中的魔鬼评论家所赞许的“难以抑制的紧迫感”。

然而，有这么多内容需要处理，读了 150 页之后，人们不免怀疑“剩下”的是否会降格为一连串熟练书写的，纽约客式的人物概评。幸好，在此书快要走下坡路之际，极权主义出来营救了。分析作曲家在斯大林、希特勒政权下被迫妥协的宿命时，罗斯又回到了其阴郁的意图上。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扭曲人格的代表。被要求解释“肖邦和李斯特音乐中的社会经济意义”时，他还曾报以嘲笑，但后来却只能局促不安地与国家，这个帮助并威胁其创作的力量，迁就融合。

与此同时，在后瓦格纳时代的德国，我们能从那些“庞大的日耳曼交响曲”中听到什么恶兆么？罗斯一开始就承认，“没有一个作曲家比理查·施特劳斯更痛苦地展现出了德国艺术精神上的崩溃”。他继而探究施特劳斯的情结，这个作曲家与纳粹政权的关系往往是矛盾中不乏机敏的周旋。在这里，罗斯思考的概念核心被置于最强的聚焦之下：音乐史是自足的，还是说一个音乐以外更大的历史可以从中提炼出来？事实上，就像罗斯解释的那样，这两种可能性是互相牵连、交叠的：“正因为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本质”，音乐才“很容易留下意识形态的烙印，并为政治所摆布。”

《剩下的是噪音》可堪一部配器改编的杰作，其核心人物不断重复出现，像交响曲中的动机一样。它在“编曲”方面如此娴熟，以至于历史本身似乎有意向罗斯示好。谁能料到，法西斯的兴起，超现实般地另许多欧洲音乐的巨人--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拉赫马尼诺夫，奥托·克伦贝勒（这里就不说曼和阿多诺了）--最终在洛杉矶成为邻居？他们之间的亲近，



使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变得所琐屑起来。当 NBC 在 1942 年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时，不少移民作曲家们“遭到嫉妒和怨恨的深重打击。”

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竭尽全力从富有同情心的好莱坞制片公司中榨出了大量资金。此后，为电影配乐成为新交响音乐在文化市场中维持生存的重要途径。好莱坞生产出了土生土长的“纯粹音乐”（用爵士乐爱好者喜欢的术语）作曲家，以及值得被称作经典的流行作曲家 -- 艾灵顿公爵，格什温，伯恩斯坦 -- 这令先锋派许多引人深思的观念通过爵士乐（常被称做“黑人古典音乐”）广为传播。

这意味着，罗斯对于战后年代的关注面应更为广泛。不可避免地，我们逐渐接近当代，待处理的材料在数量和范围上都使此书难以保持其在世纪中叶达到的密度。音乐中心的碎片化意味着故事变得愈加分散了，而我们被推向文化的边缘，无法反抗。书中那力图谈及每个人的使命感 -- 特里·雷利（Terry Riley），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托马斯·阿迪斯（Thomas Adès）-- 使其开始类似于一本用叙述伪装起来的参考书。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写，但这种努力包罗万象的使命感所产生的离心力，的确扭曲了强调的重点。问题可能出在关于即席创作与作曲的区分上，这种必要的区分也许是不成立的。相对而言，约翰·克尔特林（John Coltrane）在书中出现，似乎是因为斯蒂夫·瑞奇（Steve Reich）看过他的几场演出。而凯斯·贾内特（Keith Jarrett）则根本未被提及，即使他的即兴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某些方面代表了肇始于李斯特的，古典音乐炫技表演的顶点。

此书已涵盖这么多内容，而我们还停留在那些省略掉的东西上，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剩下的是噪音》是个了不起的成就。里尔克曾写过，他学会如何在画前更有意识地观看。而罗斯则告诉我们，如何在音乐前更有意识地聆听。

THE REST IS NOISE: Listening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Alex Ross, Illustrated. 624 pp, Farrar, Straus & Giroux.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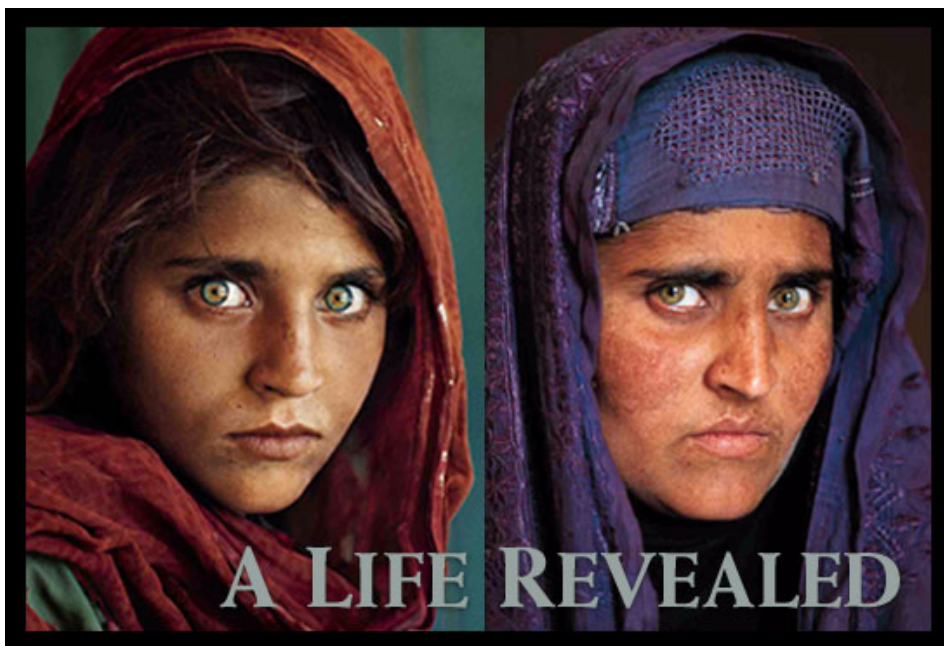
影像

阿富汗少女：Sharbat Gula

书评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1984 年，摄影师麦考瑞·史蒂夫在巴基斯坦拍摄阿富汗难民。他在一处难民营里发现了一所小学。征得老师的同意后，他到教室里为几个学生拍照片。出现在《国家地理》杂志 1985 年第 6 期封面上的少女，是这些学生中最害羞的一个。

“快 20 年了，我还记得那个难民营的嘈杂与喧闹。她的眼神那么紧张，一定有什么东西，常常浮现在她脑子里。”史蒂夫看到印出来的照片，为阿富汗少女眼中的平静所震惊。“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已经



五年了，她父母死于一次空袭”，史蒂夫想，小姑娘眼里的安宁与平静是从何而来呢？

某种在一瞬间紧紧抓住他人灵魂的特质，从少女的面孔，尤其是她的眼睛中散发出来。威廉·阿尔伯特·阿拉德说，“那是一种深蓝，又由于某种原因，你不敢期待她有那样的深湛，那专注的眼神，不仅仅要看着你，而好像要看穿你的内心。”

阿富汗少女的眼睛呈现出某种稀有矿石的颜色：黑色瞳仁外浸晕着一圈黄褐色晕轮，围着一轮祖母绿，继之一轮深蓝，它们糅合在一起，直视着我们：犹如某种相隔遥远的星云，被人发现时，已经过长久的距离和时间，然后陷入了绝对的静止。

史蒂夫中说，“看着那张面孔，犹如俯身凝视一口深井，那里倒映出你自己——你的灵魂。”

2002年，距离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过去了17年，国家地理频道决定让史蒂夫·迈考瑞去巴基斯坦寻找照片中的女孩。寻找的全过程将被制作成一部纪录片。

费了许多周折，花了很多钱，在前所未有的批评声中，史蒂夫最终找到了她。

找到 Sharbat Gula 和她的家庭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史蒂夫说。他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她的皮肤变粗糙了，有了皱纹，可她仍像17年前那样让人难忘。”她也认出了他。她一生中只拍过一次照，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看过她的照片。

新的照片刊登在2002年4月号上。国家地理后来举办展览时，Sharbat Gula 的两张照片（拍摄于2002年和1984年）总是片并列在一起。许多人在这两张面孔前流连忘返。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每每不禁感动地想，这大概是摄影所谓的伟大之处吧？它将时光流逝以前所未有的直白，摆在我们面前。

我也对史蒂夫和 Sharbat Gula 的故事念念不忘。并非为了证明史蒂夫代表的摄影传统的伟大，也无意发掘 Sharbat Gula 代表的中亚地区苦难的历程，我只是感到迷惑。我迷惑：从 Sharbat Gula 令人晕眩的眼睛里，我们为什么会窥见自己的灵魂？

我们闭上一只眼睛，熟悉的房子会变得陌生起来，一迈步就一个踉跄，为了保持平衡，只能伸出手去摸索一堵墙壁。

医学上晕眩的表征主要是失去平衡。引起这些表征的原因很多。医学解释，前庭神经掌管我们的平衡，位于内耳前庭部位的半规管上有平衡感受器，侦测头部旋转和身体移动时的平衡。然而，前庭神经和半规管引发的阵阵晕眩中，我们都不曾在一阵晕眩中看到自己的灵魂。

史蒂夫将阿富汗少女的眼睛比喻成一口井。他也许和我有着同样的幼年经验？小时候我常常趴在水井栏杆上往下看，在蔓延的荒草地中间，井下的事物包裹在黑暗里……等眼睛适应了光线，一块圆形的天空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天空倒映在水面上，人的影子映照在天空的倒影上，栩栩如生。

没有风的日子，从井中能够看到白云飘过，水面开始微微荡漾……俯身向井的观看经验仿佛灵魂出窍，让人不禁感到一阵晕眩。我站起身来，四处望望，吹着口哨走开了。

Sharbat Gula 的面部表情略显紧张，而且有些茫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生活在安全感和粮食同样缺乏的时代，在（因为暴力）动荡不安的地方，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把她带出教室，用一台带三脚架的相机为她拍照。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第一次被拍摄的经验是很奇特的。照片和相机是一种易得的事物的地方，拍摄活动能够被人感知之前，就已经频繁开始，其结果是家庭相册里普遍有几张这样的照片：婴儿们纷纷圆睁好奇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巴，莫名地笑着。

由于眼神的专注，我将婴儿们的这种反应理解为他们对镜头眩光产生了好奇。这是一种对人造物的好奇。精密的、冷色调的相机镜头，意味着难以理解的复杂和牢不可破的构造。许多摄影器材的爱好者正是带着婴儿般的好奇心，兴致勃勃地为它们深深着迷。然而一旦充当被拍摄的对象，成人就彻底失去了婴儿们的自然表现。他们脸上的肌肉带着不自然的僵硬，眼神躲躲闪闪，对机械功能的好奇心消失殆尽。他们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张照片，竭力使自己的表情符合想象中的美学标准；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被表演的焦虑感取代了。

控制面部表情或许需要专门的训练，而好奇心的丧失更加根本和不可逆转，因为这个原因，除了政客和演员，成年人的肖像照片常常令人失望。追求艺术感的摄影师追求拍摄对象在相机前的自然表现，希望拍摄对象的灵魂像飘过井底水面的一片白云，将人的本质显现在他们肌肉抽搐不止的脸上。对摄影这门技艺来说，这一过程过于艰难了。

Sharbat Gula 并不是一个婴儿（脸上的表情很茫然），好奇心局促压制着她（从紧张的唇线可以看出来），但眼神却像怀有不可遏止的好奇心的婴儿一样专注——不，比起一个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多动的婴儿来，Sharbat Gula 的眼神要专注得

多。这也许和她第一次见到相机有关。一个和善、年轻的陌生人用持重而有条不紊的动作消除了她部分紧张情绪，并且请她站在相机前面。拍摄过程非常短暂。史蒂夫收拾好器材离开了难民营，Sharbat Gula 则继续她自己的生活。

20 多年来，照片上 Sharbat Gula 异彩纷呈的眼睛为贫弱的文字提供了至少 200 种阐释的可能。这些写字的人，他们好像一个多动的婴儿，有惊人的好奇心，可是缺乏持久关注同一事物的能力。

关于 Sharbat Gula 的眼睛的 200 种阐释中，有一种认为，Sharbat Gula 异彩纷呈的眼睛并非纯粹的生理现象（趴在井口时的灵魂出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生理现象），而史蒂夫带有即兴色彩的拍摄过程，也并非只是系于偶然。也就是说，Sharbat Gula 和史蒂夫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难民营中的相遇，并非偶然性的产物：一切都因为一双必然之手而存在（想一想，Sharbat Gula 的父母死于轰炸，她却幸存了下来），在 1984 年的某个下午（史蒂夫在天黑之前来到了学校；Sharbat Gula 的老师同意他拍摄自己的学生；Sharbat Gula 身体健康，正常出勤），这双手把生有彩色眼睛的 Sharbat Gula 送到史蒂夫的相机（和至关重要的彩色胶片）前。

播弄个人命运的大手（及其所代表的必然性），在我的想象中不仅结实、带有微微凸起的青筋，而且多毛，我甚至看到上面的指甲都修剪得很整齐，边缘与肉乎乎的手指末端相齐。不要责难这种想象过于荒诞，实际上，历史上毫不犹豫地通过取消偶然来宣示必然的力量，从来都是具象甚至肉感的。它曾经被冠以宗教神祇的外观（长胡子或者不长胡子），后来才被哲学家关于“绝对”的称号（黑格尔称作绝对理性，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在快乐的、以黄色为标志色的传播学看来，必然性多毛的大手克服了摄影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1984 年的某个下午，史蒂夫行走在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难民营里，没有任何预兆表明他将拍摄出一张传播空前广泛的照片；任何一次意外都可能中断通往永垂不朽的道路：一次空袭（像炸死 Sharbat Gula 父母那次一样），道路交通拥阻（史蒂夫来不及赶到学校），稀罕的大雨（不要低估了气候的想像力），一位严肃的校长，Sharbat Gula 的缺勤，甚至，连一片云也能使曝光时间过长（发虚的影像达不到黄色杂志对肖像的苛刻要求）……决定论者从反面理解偶然性，得出的结论是决定性的大手（附身在史蒂夫的食指上）按下了快门。

有关 Sharbat Gula 的眼睛的所有 200 种论述中，要数决定论者的阐释最为流行。关于必然的历史叙事将 Sharbat Gula 的彩色眼睛（和摄影活动中随时会出现的每一个偶然）转变成永恒不变的象征。史蒂夫偶然拍下的照片不再是 Sharbat Gula 的个体形象。它变成了一块琥珀。如同生物学家研究一块琥珀（既不会变老也没有生命的时间的遗物），未来的历史学家面对 Sharbat Gula 令人晕眩的眼睛时，不会从中看到自己的灵魂；照片之于史学唯一的价值，是包含在其中的历史叙事的线索。

在现实里，循着生理现象不可逆转的规律，Sharbat Gula 的眼睛在 20 年后失去了它震撼人心的色彩（在史蒂夫 2002 年拍摄的照片中，Sharbat Gula 的眼睛不再令人晕眩），然而，这分毫未能撼动必然性的大手在摄影中的地位。因为 1984 年史蒂夫在众多偶然的驱使下拍摄的照片，因为 1985 年《国家地理》杂志的历史叙事，更因为 2002 年国家地理频道兴师动众的寻找，阿富汗少女 Sharbat Gula 不得不以一块琥珀的形象，终身和决定一场局部战争胜负的历史必然性（多毛的）大手呆在一起。

來论

吴强《威权政权的前景：民主转型还是威权延续？》读后

Dean (台北)

读吴强博士的文章（载《独立阅读》2007 年 10 月）与博客，让我对当代中国的政理解，获益甚多，但吴博士上周介绍 Linz2000 年重印的 1975 年著作，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1. 台湾的幼狮出版社并不属于中国时报，而隶属于救国团，在中国大陆的相对单位，可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幼狮出版社出了许多西方政治学著作的中译本）。1996 年中国大陆的商务印书馆出了两册的《政治学手册精选》，编者是王沪宁教授。

2. 该丛书出版社并非 Reading（这是出版社所在地名），而是 Addison-Wesley。

3. 该丛书出版 32 年之后，其实已经出了由 Robert Goodin 和 Hans-Dieter Klingemann 所编的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及其中译本《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 2006）；牛津大学将于 2008 年出齐的一套政治学手册（不含上述，共十册）；还有 Goodin 和 Charles Tilly 合编的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2006)、Russell J. Dalton 与 Hans-Dieter Klingemann 合编的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r (2007)、Rhodes 等人合编的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06)、Moran 等人合编的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2006) …。将出的还有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2008) …这十大册（Tilly 在一篇书评中就说我没有为自己的书打书之嫌，因为那一本书就要价 150 美元）还不包括国际关系；Sage 出版社于 2002 年出版了一本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合编的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相较于 1975 年 Greenstein 和 Polsby 合编的那套手册（作者都在美国大学任教），政治学国际化多了、分歧多了。

最后，如 Philippe Schmitter 最近在一次台北举办的第三波民主研讨会所说，任何地方的民主都是不完美的，东欧如此，老牌民主国家如英美亦如此，因此他非常反对用“半民主”、“缺陷民主”这些提法来称东欧的转型国家。民主并不容易，但我们也不能将太多东西加进民主这概念，以致于民主看来日益遥不可及。王怡以圣经的名义对同性恋的批判，在美国一点不少见。反移民的瑞士人民党，刚在大选中胜选…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